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当代世界主要文明区域的政教关系及其比较研究》
(05JJD770110) 成果, 并得到吉林大学博士后日常经费资助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 国家政权关系研究

(9~18世纪末)

杨翠红 /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世界主要文明区域的政教关系及其比较研究》(05JJD770110)成果,并得到吉林大学博士后日常经费资助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研究

(9 ~ 18 世纪末)

杨翠红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研究 / 杨翠红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601 - 7399 - 3

I. ①俄… II. ①杨… III. ①东正教 - 关系 - 国家机
构 - 研究 - 俄罗斯 IV. ①B976. 2②D751. 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4453 号

书 名: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研究
作 者: 杨翠红 著

责任编辑: 李国宏 (sheira@163.com)

责任校对: 李国宏

封面设计: 刘瑜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印刷: 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65 千字

版次: 2011 年 7 月 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01 - 7399 - 3

定价: 27.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罗斯洗礼:政教关系的确立(9~10 世纪)	(9)
第一节 罗斯王公与基督教的早期接触	(9)
第二节 确立拜占庭基督教为国教	(21)
第二章 基辅罗斯和谐发展的政教关系(988~11 世纪中叶)	(31)
第一节 东正教势力在罗斯的扎根和早期发展	(31)
第二节 东正教罗斯化的开端	(36)
第三节 东正教促进新兴封建国家的发展	(43)
第三章 罗斯封建割据时期的政教关系(12~13 世纪初)	(75)
第一节 主教为地方王公服务	(76)
第二节 教会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88)
第四章 蒙古统治时期的政教关系(13 世纪初~15 世纪末)	(94)
第一节 蒙古统治前期的政教关系	(95)
第二节 蒙古统治后期的政教联盟	(102)
第五章 莫斯科国家时期的政教关系(1480~1598 年)	(112)
第一节 统一的国家需要统一的教会	(113)

第二节 王权对异端和官方教会的利用·····	(121)
第三节 教俗双方关于教会地产的斗争·····	(124)
第四节 教会与沙皇专制的确立·····	(129)
第六章 混乱时期和罗曼诺夫王朝初期的政教关系	
(1598 年 ~ 18 世纪末) ·····	(140)
第一节 尼康改革及教会分裂·····	(141)
第二节 教会成为沙皇专制驯服的工具·····	(146)
第三节 教会成为沙皇政府的附庸·····	(156)
第四节 东正教是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的工具·····	(162)
第五节 俄罗斯帝国利用教会镇压农民起义·····	(165)
结 语·····	(171)
参考文献·····	(173)
附 录·····	(185)

前 言

踏上俄罗斯的国土,随处可见色彩绚丽的教堂和熠熠生辉的十字架。东正教是当前俄罗斯联邦的最大宗教,“该教有教徒约 8000 万人,占全俄罗斯居民的 1/2,遍布整个俄罗斯。”^①东正教在俄罗斯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对俄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信仰是历史的主导性起因,宗教信仰是全部文明的基础,俄罗斯和西方的区别就是由此决定的。俄罗斯的本原是东正教信仰,西方的本原是天主教信仰。”^②东正教是阐述俄国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本书选取政教关系(国家政权与教会权力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考察俄国政教关系的演变历程,由此探索俄国历史的特殊性。

俄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不同于西欧国家中世纪前期教权凌驾于政权之上的状况,马克思关于俄国的政教关系论述道:“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在拜占庭帝国,国家和教会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不叙述教会的历史,就无法叙述国家的历史。俄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③俄国的政教关系也具有类似拜占庭帝国政教关系的特征。“拜占庭

① 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4 页。

② 尼·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邱守娟译:《俄罗斯思想》,北京: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4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41—142 页。

帝国政教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处理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即东正教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其理想是国家与教会的和谐共处,如果把教会和国家看作是两种权力的话,那么这个理想就是“两种政权和谐”,这是所谓的‘拜占庭主义’的核心思想。”^①

俄国著名教会史学家卡尔塔绍夫对“两政权和谐”理想有过精彩的描述:“教会与国家不应相互仇视。世俗王国和上帝之国不应相互冲突,而应处于完全和谐和一致之中,它们应该相互帮助,但不能剥夺每一方在其自主领域里的自由和独立性。如果用正式术语表达,这就是‘交响乐’。这个术语源自查士丁尼皇帝(6世纪)的第六法典。根据这部法典,教会与国家是上帝给人类的两个恩赐,即事物的两种秩序,它们出自同一个源泉,都是上帝意志确立的,所以,为了服从这个意志,它们应该处在完全的一致之中(consonantia ‘交响乐’)。教会负责上帝的、天上的事务。国家负责人间的、地上的事务。同时,国家应该全力维护教会的教义和神职人员的尊严。神职人员应与国家一起领导这个社会生活按照上帝所希望的道路前进。在这种以基督教为目的的理想统一中,国家与教会在思想中呈现为同一个有机体的两种不同的职能。在艾帕拿高卡法典(9世纪出版的拜占庭法典)里,它们的统一被比喻为人的灵魂与肉体的统一;支配每一方的权力都符合其本性:皇帝统治肉体,牧首统治灵魂。”^②

“两政权和谐”理想在拜占庭尚且很难实现,在俄国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罗斯通过引进外来宗教确立政教二元制权力结构的典型国家。关于俄国二元制权力结构有许多设想,莫斯科的僧侣主张:“一个是教会的、圣徒的权力;一个是沙皇的、人间的权力。”^③在西方,社会力量的对比,长期对这一问题作有利于“圣徒”权力

① 乐峰:《俄国宗教史》(上卷),第435页。

② 卡尔塔绍夫:《重建神圣的罗斯》,莫斯科:首都出版社1999年版,第71-72页。转引自乐峰:《俄国宗教史》(上卷),第435页。

③ M. A. 季亚科诺夫:《古代俄罗斯政教关系史》,第88页。转引自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7页。

的解决;在罗斯,——本来还是在莫斯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相反地,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有利于人间权力,——最初有利于大公权力,后来有利于沙皇权力——的解决。^① 政教关系不仅要协调两种权力的内部矛盾,还要受外部因素的长期影响,如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等,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教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俄国学者十分关注东正教问题的研究,19 世纪中叶产生了俄国教会史学。宗教人士以得天独厚的优势最早涉足这一领域:1847 费拉烈特写成《俄国教会史》,1881 年都主教马卡里完成《俄国教会史》,两部作品是俄国教会史的开山之作,虽然是通史性作品,却为教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 世纪初,著名教会史学家、神学家 E. E. 戈卢宾斯基的专著《俄国教会史》出版(1903 年),是教会通史研究的代表作。十月革命以后,流亡法国的教会史学家卡尔塔绍夫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国外出版了《俄国教会史》,“卡尔塔绍夫在俄国教会史中的贡献是他创立了‘世俗’教会史学。”^②

以 C. M. 索洛维约夫和 B. O. 克柳切夫斯基为主要代表的俄国史学家开始关注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中的作用,认为东正教的传入符合罗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克柳切夫斯基在《俄国各阶层史》中指出:“当教会在国家社会的一旁建起一个由同样成分构成、基础完全不同的特殊社会之后,国家社会结构本身也受到教会的强烈作用。”^③索洛维约夫在《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中指出,主教和教士积极参与国家政权事务,是大公必不可少的谋士。^④“总主教^⑤手下的大贵族和臣仆后来甚至同王公手下的军人一道参加武装保卫国家的行动,在总主教的特别督军统率下,随

① 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 1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37 页。

② 《祖国历史》,2000 年第 2 期,第 127 页。(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 2000, с. 127.)

③ B. O.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各阶层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48 页。

④ C. M. 索洛维约夫:《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第 1 册),莫斯科 1959 年版,第 260 页。(С. М. Соловье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 их времени. Кн. I, М., 1959, с. 260.)

⑤ 即都主教,作者注。

军出征。”^①教会的活动有利于罗斯人提升道德意识和融洽家庭关系。

以B. H. 塔吉谢夫、B. B. 季特林诺夫等为代表的俄国史学家认为教会对国家政权的影响是消极的,并批判了神甫和教会的活动。^②塔吉舍夫认为什一税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给教会的,后来被取消,因为它只能给当时国家的其他需要带来损失。反对索洛维约夫为教会拥有的财富辩护,认为“教会的财富是为穷人的”^③观点。

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中的作用给予公允的评价。他们认为: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具有进步意义,“第三罗马”说有利于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提升。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认为:“基督教确认政权是神授的,因此,它成为巩固封建制度和国家威信的思想武器。”“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罗斯获得了较高的拜占庭文化的某些因素,同其他欧洲人一样,吸收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遗产。由于接受了新宗教,古罗斯的国际地位提高了。”^④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通史》认为:“基督教比起多神教来是一大进步。它使基辅罗斯的封建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促进了文化联系的扩大。”同时也“加速了斯拉夫各部落的统一过程,并加强了大公的权力。”^⑤诺索夫主编的《苏联简史》认为:“罗斯的统治阶级从基督教中获得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基督教的教堂又可作为新设的各地的政治机构,以执行从宗教上维护现存制度的任务。其次,罗斯接受基督教,也从思想上巩固了古罗斯国的统一。最后,在基督教传入的同时,罗斯有了文字,并且有可能利用拜占庭(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比较发达的文化。”“基督教传入后,古罗斯国扩大并巩固了同国际的联系。作

① B. O.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各阶层史》,第47页。

② B. H. 塔吉舍夫:《俄罗斯史》(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年版,第236页。(B. H. Татище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Т. 2, М. - Л., 1963, с. 236.)

③ С. М. 索洛维约夫:《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第1册),第262页。

④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3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42页。

⑤ А. 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82-83页。

为基督教国家,它不仅同拜占庭建立联系,而且同天主教国家也有交往。”^①具体分析教会不同时期对政权的不同影响。克雷维列夫认为:“神甫的不同集团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而进行活动。这种利益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驱使他们或者支持集权主义倾向,或者支持分立主义倾向。但是,在集权主义倾向的胜利已成定局时,教会当然也就开始支持中央政权。”^②尼科利斯基认为:“东正教作为封建意识形态要使阶级社会的基础神圣化并调和劳动人民同统治阶级的关系。教会作为封建设施不仅要从精神上,而且也要从经济上压迫人民群众。”宗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并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促进因素、超验的推动力,”东正教会的思想和实际活动都具有反人民的性质,它表现在东正教与专制政权的联盟,“教会等级制度和神职人员直接参与了沙皇政权对人民群众反抗压迫者的行动的镇压。”^③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史学家Я.Н.夏波夫著有《10~13世纪古罗斯国家与教会》,这是一本专门研究基辅罗斯时期政教关系问题的著作。作者以教会为出发点,从教会的行政机构和管理机构的形成和发展、教会的政治作用和物质保障形式、城市教堂和修道院在国家机构中的作用、教会的政治立场和活动等方面论证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我国关于俄罗斯东正教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卓有建树的专著有乐峰的《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俄国宗教史》(上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戴桂菊的《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关于俄罗斯教权对政权影响的观点主要为两种,一种观点为肯定东正教对罗斯社会的积极作用:东正教促进了罗斯封建关系的形成,巩固

① 诺索夫:《苏联简史》(第1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1—52页。

②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6页。

③ Н.М.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丁士超、苑一博、杜立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了大公的权力。^① 东正教宣扬君权神授,提倡忍耐、服从,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秩序和稳定。^② 东正教提高了基辅罗斯的国际地位,使它跻身于欧洲文明国家的行列。^③ “第三罗马”说树立了莫斯科大公在各公国的权威地位,提高了莫斯科公国的国际地位。^④ 教会号召罗斯人结束内讧,一致对外,恢复民族主权,加强民族凝聚力,帮助莫斯科公国推翻蒙古统治,并在 17 世纪积极参与反抗波兰、瑞典的武装干涉。^⑤ 东正教的传入加强了罗斯与拜占庭的文化交流,促进了罗斯文化的发展,如文字、教育、史学、文学等。^⑥ 另一种观点强调东正教会对罗斯社会的消极作用:接受东正教客观上导致了罗斯国家同西方文化的疏远,使俄罗斯社会落后于西欧。^⑦ 在蒙古统治时期,“教会和主教们不但没有号召、动员居民奋起抵御外来侵略,反而跟征服者和平相处,同流合污,充当内奸,背叛人民,明里暗里帮助侵略者奴役罗斯人。”^⑧ 在彼得时期教会成为阻碍彼得改革的重要力量,“改革的初始动因是为了克服教会保守势力这一全面改革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改革的结果,不仅克服了这一障碍,而且还使它成为推动其他各个方面改革的一种辅助力量。”^⑨

本书内容的主线是研究俄国国家政权与东正教会的关系,分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中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归纳出各时期东正教会

① 朱寰:《世界通史》(中古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5 页;孙成木等:《俄国通史简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2 页;乐峰:《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5—96 页。

② 李景云:《东正教与 17 世纪以前的罗斯文化》,《南开学报》,1999 年第 1 期,第 84 页。

③ 孙成木等:《俄国通史简编》(上册),第 22 页;乐峰:《东正教史》,第 96 页。

④ 李景云:《东正教与 17 世纪以前的罗斯文化》,第 85 页;戴桂菊:《东正教与俄罗斯改革》,《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55 页。

⑤ 戴桂菊:《东正教与俄罗斯改革》,第 57 页;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7 页。

⑥ 朱寰:《世界通史》(中古分册),第 65 页;孙成木等:《俄国通史简编》(上册),第 22 页;李景云:《东正教与 17 世纪以前的罗斯文化》,第 85 页。

⑦ 戴桂菊:《俄罗斯东正教探源》,《世界宗教研究》,1998 年第 4 期,第 99 页。

⑧ 乐峰:《东正教史》,第 102 页。

⑨ 苑一博:《彼得一世的教会改革》,《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4 期,第 54 页。

和国家政权的关系特点及其演变的规律性:(1)“罗斯洗礼”是罗斯引进外来宗教的必然选择,确立拜占庭基督教为罗斯国教,由此确立了罗斯教权依附于王权的政教关系的传统。(2)基辅罗斯时期是俄国罗斯国家和教会的初步发展时期,二者关系和谐。统治阶级引进、推行东正教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罗斯大公在国家的统治地位,有利于新兴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东正教确实促进了罗斯封建关系的确立,有利于罗斯封建经济的发展,并在古罗斯文化的基础上,促进了罗斯文字、文学、建筑技术、艺术和教育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东正教会依附于中央王权发展自身势力,并为中央王权服务。(3)封建割据时期,罗斯国家统一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但东正教的都主教依然存在,中央一级的政教联盟解体;各地方王公的势力迅速强大,普遍发展的各地教区与地方王公结成联盟,出现了教区主教各为其主的局面。教会作为统一国家的象征,积极推动罗斯对外关系的发展——争取摆脱拜占庭的政治、宗教束缚;发展对西欧天主教国家的关系;向周边国家传播基督教,并积极参与抗击外来侵略。(4)蒙古统治时期,蒙古入侵使东正教会和教堂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随着蒙古统治者认识到利用东正教进行征服和统治的益处后,随即改变对东正教的策略:保障教会的物质利益和教会人士的生命安全,东正教会也开始为蒙古统治者服务,宣扬蒙古统治的合理性。教会与各公国王公都依附于蒙古统治者。由于教会得到了蒙古人和地方王公双重支持,因此教会势力迅速发展,并在二者之间周旋,从中渔利,成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当教会看到蒙古统治者大势已去,莫斯科公国具有统一全国的潜力时,转而支持莫斯科公国,帮助莫斯科公国打败其他各公国,并推翻蒙古统治。(5)莫斯科国家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各教区也统一在莫斯科都主教的控制之下,实现了教会的统一,政教双方为建立统一的国家互相利用。同时双方矛盾逐渐产生:教会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大,直接威胁到莫斯科大公的统治,莫斯科大公利用异端制约官方教会,利用教派斗争削弱教会地产。沙皇伊凡雷帝利用教会加封圣徒、加冕典礼等形式使皇权神圣化。

(6) 罗曼诺夫王朝初期。教会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积极参与镇压农民运动的活动,并成为沙皇对外扩张的工具。教会是俄国专制制度强大和稳固的重要思想武器。经过尼康教会改革的失败,从彼得一世教会改革,到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教会已无力与强大的沙皇对抗,成为沙皇专制的驯服工具。

总体来说,政权和教权之间是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在俄国历史上政教联盟经历了建立——解体——再建立的过程。即使在政教联盟时期,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不断发生,围绕教会特权、教会地产等问题二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纵观 9 ~ 18 世纪俄国的政教关系,政教之间利益的共同性是联盟存在的基础,二者利益的特殊性使政权与教权不断发生矛盾斗争。政教联盟内部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的消长是决定政教关系的重要因素。

第一章 罗斯洗礼:政教关系的确立

(9 ~ 10 世纪)

列宁说过:“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方,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①罗斯国家的建立正是罗斯封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罗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国家,加强大公的权力,引进了拜占庭基督教(即东正教)^②成为其必然选择,由此确立了俄国教权依附于王权的政教关系传统。

第一节 罗斯王公与基督教的早期接触

东斯拉夫社会在9世纪中叶开始分化成两个对立的阶级:以部落酋长为首的上层分子,利用职权把肥沃的土地和战利品据为己有,从而成为富裕贵族,势力

①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27页,第31页。

② 基督教于公元1054年分裂为罗马公教和希腊正教(东正教),本文为与罗马公教相区别,将分裂前后的拜占庭基督教统称为东正教。

强大的酋长征服邻近部落后称为王公。公元862年,瓦良格人留里克应诺夫哥罗德贵族的邀请平定了当地的叛乱,建立了留里克王朝。882年,奥列格挥师南下,占领基辅,并迅速征服邻近的德列弗利安人、拉基米奇人和塞维里安人等部落,降服了第聂伯河流域诸王公,由此形成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古罗斯国家(即基辅罗斯),奥列格被尊称为“大公”。酋长豢养长期随他作战的亲兵,依势强占土地和牧场,成为特殊的军人阶层。大公、王公贵族及其亲兵构成基辅罗斯的统治阶级,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主要是农民、农奴和奴隶。

一、引进基督教是新兴罗斯国家的政治需要

1. 新兴的国家政权需要宗教的职能统治人民

基辅罗斯国家的建立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基辅罗斯国家建立之前,东斯拉夫人的社会还处于原始公社制阶段。根据古文献和考古发掘的史料,可以把8~9世纪的东斯拉夫人分成三个群体:斯洛温人和克里维奇人组成东斯拉夫人的北部群体;维亚吉奇人、拉基米奇人和塞维里安人组成东部群体;波利安人、德列弗利安人、乌里奇人、德列哥维奇人、特维尔茨人、杜列伯人和霍尔瓦特人组成西南群体。

东斯拉夫人的北部、东部群体实行火葬,墓中埋着许多人的骨灰。这是氏族制度下集体埋葬的特点。斯洛温人还把熊的爪、牙和骨埋入墓中,这是原始图腾崇拜的反映。《往年纪事》记载:“拉基米奇人、维亚吉奇人和塞维里安人有相同的习俗:像野兽一样生活在森林中,吃不洁净的东西,当着公公和儿媳的面说粗野的话”。^① 编年史还说,这三个部落联盟都实行抢婚制。像这样的部落在整个罗斯平原上有很多,每一个部落都召集人民会议,一切的事情都由部落人民会议来决定,

^① 《往年纪事》(第1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第211页。[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ПВЛ). Ч. I, М. - Л., 1950, с. 211.]

这种会议被称为“卫彻”。这说明在公元8世纪前后东斯拉夫人处于氏族公社制阶段,基本的社会组织是父权制家庭,人民大会行使公共权力,还没有形成国家。

时至9世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铁制工具代替了骨制和青铜制工具,农业生产已使用铁犁、铁镰、铁斧等,以砍伐树木、放火烧荒的办法开垦土地,用牛马来耕作,轮耕制也渐趋普遍。在手工业方面,当时炼铁技术已经相当发达。“斯拉夫人住的某些村落,曾发现几十个流过铁水的炼铁炉。至于小铁铺,那几乎每个村子都有。”^①陶器、纺织、木材加工业、毛皮和皮革制作业等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逐渐走向专门化。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许多部落、部落联盟的中心逐渐演变成手工业、商业中心。例如基辅、契尔尼哥夫、斯摩棱斯克、诺夫哥罗德等。部落内部出现了贫富差别。“公侯和领主的坟墓都是些规模巨大的土冢,要堆成一个这样的大土冢,需要成千上万个农民的劳动。”在他们的坟墓中“有整套各种各样的兵器和盔甲、金银器、珍贵的外来器皿以及被烧死殉葬的男女奴隶的残骸”。^②这说明当时社会已有阶级分化,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奴役农民。由此可见,东斯拉夫人各部落已经渡过了漫长的原始公社制社会,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建立东斯拉夫人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已经具备。

据《往年纪事》记载,862年,瓦良格人首脑留里克兄弟接受诺夫哥罗德贵族的邀请,率兵来到诺夫哥罗德城,平定了叛乱,并征服了北部地区其他斯拉夫人和非斯拉夫人部落,确立了罗斯王公的统治,这是留里克王朝统治罗斯地区的开始。留里克死后,继位的奥列格于882年南下夺取了基辅,建立起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封建国家,史称“基辅罗斯”。罗斯王公继续征服第聂伯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国家版图不断扩大。但基辅罗斯王公的征服,除了向被征服地区人民征收一定贡物之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索贡巡行制度依然是基辅罗斯建

① 诺索夫:《苏联简史》(第1卷上册),第37页。

② 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3卷上册),第331-332页。

国初期统治阶级的主要剥削方式,依然是当地人民沉重的负担。945年伊戈尔大公及其亲兵队对德列弗利安人部落的第二次索贡引起德列弗利安人的强烈不满。“德列弗利安人听到伊戈尔又来索贡的消息后,义愤填膺,说:‘如果豺狼有了来找牛羊的习惯,就会不断地再来,直到把牛羊吃光,除非把它杀掉。’德列弗利安人奋起反抗,消灭了伊戈尔的亲兵队,并杀死了伊戈尔本人。”^①

新兴的罗斯国家虽然已经建立,但其内部还保留着大量原始和奴隶制的残余,各地区和各部落还存在很大的独立性。基辅罗斯实际上是各部落的松散的联合体,各部落之间缺乏必要的内在联系,各自为政,不利于罗斯大公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同时,组成基辅罗斯的各部落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的“卫戍”制度,即重大事件由部落内部召开会议决定,这不利于巩固和加强罗斯大公权力。弗拉基米尔大公以前的罗斯大公(如奥列格、伊戈尔、斯维雅托斯拉夫),主要诉诸武力征服广大地区。奥列格打败哈扎尔人、塞维里安人和拉基米奇人,占领了第聂伯河东岸和契尔尼哥夫地区。伊戈尔征服了乌里奇人和特维尔茨人,将基辅罗斯的疆域扩展到第聂伯河以东地区。斯维雅托斯拉夫曾于965—968年大规模出兵,相继灭掉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王国和哈扎尔汗国,征服高加索。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以后,如何维护其统治是罗斯大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弗拉基米尔统治之初,一方面利用武力巩固国家,平定了长达8年之久的国内反对大公政权的叛乱,并镇压了维亚吉奇人、拉基米奇人、霍尔瓦特人的反抗,重新把东斯拉夫人的广大地区统一在自己的政权之下。弗拉基米尔镇压了反叛的部落和部族,对领土实行再征服,只是完成了列宁所说的“刽子手的职能”,但“牧师的职能”却无法解决。而“牧师的职能”却是巩固政权、加强统治、维护王公贵族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所必需的。于是,引进外来宗教成为历史的必然。

^① 《往年纪事》(第1册),第40页。